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



武
汉
大
学
学
术
丛
书

Academic Library

Wuhan University

司马朝军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



武

汉

大

学

学

术

丛

书

Academic Library

司马朝军 著

Wuhan Universit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司马朝军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11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ISBN 7-307-04628-8

I. 四… II. 司… III. 四库全书—图书目录—编辑学—研究
IV. Z8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3090 号

责任编辑:陶佳珞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支 笛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wdp4@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80 1/16 印张: 49.875 字数: 711 千字 插页: 3

版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307-04628-8/Z·91 定价: 82.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章培恒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至其为功为过，则在学者中存在着不同的甚至尖锐对立的见解。誉之者谓为中国典籍的总汇，其中保存了许多失传的古书、珍贵的版本；斥之者视为中国文化的罪人。后一种意见可以鲁迅先生为代表。他说：“清朝的考据家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二）》）对于“删改原文”，他在该篇中还举了《四库全书》本《容斋三笔》和《嵩山文集》的各一个例子，以显示出其删改范围之广。不过，鲁迅先生所举的那两条，都牵涉到宋金的矛盾，因而具有“政治性”；至其更常见的删改，则是把底本中不通或看似不通的文字改得通顺。其结果，或是把底本不错的改成错误，或是把脱误加以掩盖，使人不致产生怀疑，因而更不易追寻原貌。所以，尽管鲁迅先生的意见在近若干年来常被某些人溢为“过激”，但我想，至少他对《四库全书》的看法还是对的。

当然，《四库全书》中确保存了好些失传的古书，尤其是辑自《永乐大典》的那一批。由于《永乐大典》绝大部分已经被毁，《四库全

书》中的这些辑本确是弥足珍贵了。虽然,如果把《四库》所辑和少量倖存于《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加以对勘,仍不难发现前者的“删改原文”的陋习。而且,《四库全书》的这种价值的取得,实在也不能不使像我这样杞人忧天式的人物对大清皇帝此一“盛世修书”的伟业颇为感慨;国家的后来越弄越糟,以致《永乐大典》也惨罹浩劫,恐怕跟纂修《四库全书》所体现出来的思想统制与文化政策也不无关系吧。

不过,后人虽对《四库全书》有种种议论,对《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却都是肯定的,我的老师一辈的学者和他们的前辈中,有有些人是将此书作为治学的入门书的,连鲁迅先生也说:“现在有一些老实人,和我闲谈之后,常说我书是看得很多的,略谈一下,我的确也好象书看得很多,殊不知就为了常常随手翻翻的缘故,却并没有本本细看。还有一种很容易到手的秘本,是《四库书目提要》(即《四库全书总目》——引者),倘还怕繁,那么,《简明目录》(《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也可以,这可要细看,它能做成你好象看过许多书。”(《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可见《四库全书总目》对于扩大学术视野和增加知识确是大有好处的。

然而,这还只是就博览这一方面而说;倘要正经做学问(当然这里所说的只是古代文史之学),也可以从《四库全书总目》中找到门径,并且对此书是非看不可的。例如,要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那就应该先读一读《四库全书总目》中有关的别集、总集和诗文评论部分,以了解现在保存下来的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书籍有多少(当然,《四库全书》编纂后所发现或所编的有关图书不在其内),其各自的地位和特点又如何,然后按图索骥,作进一步的研究。不过,在作研究时,应该尽量以优于《四库全书》本的版本为依据。

一般说来,《四库全书总目》的各书提要不仅能对该书作出扼要介绍,有时还有颇为精辟的见解或重要的信息。所以,即使是作个案研究,也必须先读一读《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有关提要,否则有可能造成事倍功半的遗憾。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有些提要实在写得不怎么样,有的泛而不切,有的判断不当,个别的更流于谩骂,例如为李

赞《藏书》所作的提要说：“赞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此书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特以赞大言欺世，同时若焦竑诸人几推之以为圣人，至今乡曲陋儒震其虚名，犹有尊信不疑者，如置之不论，恐好异者转矜创获，贻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史部·别史类存目·藏书》）那就跟后来的“大批判”文章一脉相通了。

《四库全书总目》作为一部在整体上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书籍，其所以显现出如此复杂的面貌，首先是由于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本有其政治目的，《四库全书总目》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自不得不贯彻其政治意图，而且即使在非关键的学术问题上他也要插一手，发布指示，当然也不得不凛遵无误；其次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者虽然都可称为学者，但学术水平高低不一，在思想上也颇有歧异。例如戴震，不但学术成就高，又是杰出的思想家；而翁方纲则不仅在学术上不如他，在思想上与戴震也有分歧。出于两人之手的提要，自不得不有种种差别。

也正因此，《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其编纂过程固然值得探讨，编纂过程中导致《四库全书总目》的上述面貌的种种复杂情况更有必要加以阐明。这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四库全书总目》这部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使用它——充分发扬它的优点并尽可能防止它的误导，而且也可为我们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因为现在集体攻关项目越来越多，这虽与《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是不同的性质，但在怎样组织和发挥集体的力量这一点上，却是有经验和教训可以吸取的。

但这是一项高难度的、艰苦的研究工作，不但要搜集大量的资料，加以精细的鉴别，更需要具有识力。而在我看来，司马朝军副教授就正是具有这样的识力的学者。他自述其从事此项研究的主旨是：“现在，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诸色人等在《总目》编纂过程中的贡献作出评价，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以翁方纲还之翁方纲，以戴震还之戴震，以纪昀还之纪昀，以陆锡熊还之陆锡熊，以于敏中还之于敏中，以清高宗还之清高宗。只有如此，才能谈得上客观公

正。”这真是精警之见，深中肯綮。至其在资料方面的竭泽而渔，辨析的深慎，更是其一贯的作风。所以，《〈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之成为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固非倖致，但就司马朝军副教授而言，却也是必然之事。

此书是司马朝军副教授在复旦大学中文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期间的成果，也是他的出站报告。作为这个博士后流动站的负责人，我为我们站能出这样扎实的、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而深感欣幸。

一部扎实厚重、突破创新的 四库学前沿之作

——读《〈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有感

□王俊义

当司马朝军教授的新著——《〈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即将付梓之际，承作者厚爱以样稿见示，且嘱写篇序文。如此雅意，至为铭感。然对写序之谓，却犹豫再三，因我对《四库全书》及其《总目》并无专门研究，惟恐班门弄斧，反有损本书的光泽。然继而思之，个人厕身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有年，对于与清代学术思想密切相关的四库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当应先睹为快。遂抱着急于求知的心情，很快通读了朝军教授的书稿。读后沉思，既感深受教益，又觉欣喜不已：一喜四库学的研究后继有人；又喜司马君此著在学术上的突破成就；再喜武汉大学出版社慧眼识珠，将此著纳入能代表该著名高等学府学术水平的《武汉大学学术丛书》。实大喜过望，遂情不自禁地写了这篇读后感，既略抒学习心得，又算是对朝军赐书索序的交待。

一位优秀的青年学人

说实话，我与朝军至今尚未谋面，只是从媒体的学术信息和他本人已有的著作中获知，他是一位孜孜不懈，致力于四库学研究的青年学者，且成果丰硕，卓有成就。他在此书之前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就曾受到四库学领域知名学者的高度评价，认为“是该领域具有开拓性的前沿之作”；他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四库全书总目》与文献整理研究”，又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评为优秀项目，给予高度肯定说：“司马朝军历经多年默默耕耘”，“全面发掘了《总目》的丰富内涵，是目前国内外第一部从文献整理角度系统研究的专著”。不仅肯定其是“高水平的优秀著作”，而且赞扬其“严谨的治学精神”。为此，国家社科规划办还授予他“信誉良好专家”称号。他在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的出站报告——《〈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又再次被流动站专家组全票评为优秀，专家组在鉴定意见中指出，其“对《总目》编纂过程作了全面、深入的考察，作者从原始文献出发，发掘了鲜为人知的新材料，提出一系列独到见解。鉴于报告是一部出色的学术专著，对四库学的研究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对研究18世纪思想史、学术文化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专家组全票评为优秀”。而目前，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本书，正是其在出站报告基础上，再经修改提高成书的。我之所以满怀喜悦之情，列举本书作者在学术研究中多次受到的肯定与赞扬，意在证明，而且我确信司马朝军，无疑是四库学研究领域的佼佼者，是一位学风扎实，积累丰厚的优秀青年学人。我想，学术研究的发展，同自然界、社会界的发展一样，总是“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新陈代谢，前后传承。人文社会科学的前进与发展，很需要像朝军这样的优秀青年学者，接过传承棒，在前辈学者奠定的阶梯上，继续攀登，向前推进！

内容丰富 翔实厚重

由于作者对四库学研究有坚实的积累，在阅读中首先感到的是本书扎实厚重，内容丰富翔实。全书洋洋洒洒，达数十万言，在结构安排上，除“引言”、“结论”、“余论”外，另有八章三十余节篇幅，与作者前此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相衔接呼应，在全面、深入考察《总目》的编纂背景、过程的基础上，更加侧重于原原本本地、条分缕析地论述、考订四库全书馆各分纂官，如戴震、周永年、任大椿和程晋芳、翁方纲、邵晋涵、姚鼐等，总纂官纪昀、陆锡熊，总裁官于敏中及最高决策者清高宗等，在《总目》编纂过程中是如何分工的，各自做了哪些工作，作用的大小，贡献的多少，都予详加考察，细致论述。对这些问题，过去的有关论著虽有所接触，但多半是或有论述，却语焉不详；或因占有材料不足，评论偏颇；甚或主观臆测，论断有误，以致造成学界在《总目》研究中，对有些问题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又对有些疑难问题，聚讼纷纭，悬而不决。本书则在发掘和掌握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经过精审考证，对上述问题，作出恰如其分、符合实际、相对准确而有说服力的回答与解决。如此丰富翔实的内容，精密的考据，细致地论述《总目》的编纂问题，这在《总目》研究史上尚属首次。据此而论，肯定本书扎实厚重，对于《总目》编纂问题的研究有重大推动作用，当非过誉之词。

竭泽而渔 发掘史料

我还突出感到本书另外的闪光之点，是作者继承发扬了中国传统考据学的优良学风，遵照其业师著名古文献学家曹之先生强调的“竭泽而渔”的方法，对所研究的每一问题，都不偷懒，不取巧，而是尽可能对有关材料，广为搜集，大量占有，网罗无遗。然后，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严密考证，得出结论。自觉地改变了过去那种“以论带史”的空洞教条模式，

真正做到论从史出。当然，要这样做，必须花大气力，下大功夫，要有坚强的学术毅力，而作者则正是这样做的。以本书第五章《翁方纲与〈四库全书总目〉》为例，翁氏是四库馆分纂官中撰写《总目》提要稿最多的一位，多达千余条，皆收入《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之中。翁氏的“提要稿”与《总目》有何异同，乃是学术界颇为关注的问题。然而，因《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手稿本流落在澳门，其过录本虽收藏在内地，却长期处于“深闺人未识”之中，长期以来阅读利用的人不多，更少有学者对之作穷尽性研究。朝军为彻底弄清事实真相，在认真阅读翁氏所撰全部四库提要稿的基础上，又参考翁氏的《复初斋文集》及本人的其他著述，再搜集海内外与之相关的所有文献资料，将翁氏全部提要稿，与《总目》直接相关的提要，相互对勘，逐条比照，就二者的异同，得出确凿的结论说：存在六种情况：1. 相同类；2. 增饰类（笔者按：此类中又细分为：（1）增材料；（2）增评论；（3）增案语；（4）增材料又增评论等小类）；3. 删改类（笔者按：此类中又细分为：（1）删材料；（2）删评论；（3）改材料；（4）改评论等小类）；4. 未撰提要；5. 重拟类；6. 《总目》未见著录。同时，书中还对上述各类情况中的各个大类与各个小类都各有多少条，在提要稿总数中又各占多少百分比，加以数字化的精确统计说：“以上六大类总计 1 150 条，前三类所占比例为 49.39%；后三类为 50.61%。”换言之，一半以上是完全不同的，接近一半的提要稿（按：包括相同类）经过不同程度的修改润色。这样的结论比之原来有些学者所谓“二者无一相同”的笼统说法，显然更加科学和严密。这对《总目》编纂情况的研究，当然有很大推进。不过，提要稿与《总目》所呈现的上述各种不同情况究系什么原因，作者如能做些分析与说明当更完善。书中对其他问题的论述与考订，大都运用了这种“竭泽而渔”、“全文信息”的方法。结论看来简单明了，但在得出结论的背后，却凝聚了作者无尽的汗水与心血，真乃“梅花香自苦寒来”。相较于当前学术界存在的某些浮躁张扬，急功近利，不认真读书，走捷径，不从原始资料出发，以致或人云亦云，或想当然下结论的不良学风，本书作者这种甘坐冷板

竟，十年磨一剑的潜心钻研学风，实令人击节赞叹。

突破创新之论迭出不穷

学贵创新，一部学术著作能否站得住，是否有生命力，关键在于是否有所创新，能否发前人所未发，言前人所未言。而本书的突出可贵之处，恰在多有开拓创新。书中不仅揭示了大量新材料，而且提出不少新观点，得出许多新结论。诸如《总目》著作权的问题。此前学术界曾有“馆臣集体意志”、“纪昀一手所成”、“乾隆钦定”等各种说法，而本书作者在查阅大量第一手资料后，认为上述说法都不能涵盖所有材料，因此提出《总目》的编纂过程以往被简化了，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它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其中有分纂官起草，是编纂工作的起始阶段；又由总纂官修订，其中纪昀与陆锡熊都有很大作用和贡献；再由总裁官裁正，于敏中做了不少切实的工作。总纂官与总裁官的工作是统一体例，统一思想，解决疑难问题阶段。最后，由清高宗乾隆钦定，事实还证明乾隆并非徒具“钦定”之虚名，编纂过程中他不仅屡发谕旨，提阅审读成稿，而且对馆臣提出和反映的各种问题，最后再由他拍板定案。能就《总目》编纂过程作出如此符合实际的论述，本书乃是首次，这就使过去所谓“纪昀一手所成”等说法，难以成立，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又如，对于纪昀和陆锡熊这两位总纂官在四库馆中的业绩，过去的有关论著中有“扬纪抑陆”的倾向，本书依据史实，既肯定了纪昀的作用与贡献，也用大量资料证实，陆锡熊也同样作出重要贡献，其功实不可没，应予公允评价。再如，对于《总目》中经、史、子、集各部类书籍提要的撰写者，过去也有学者提出“经部属之戴东原”，“天文算法类各篇提要皆出震之手笔”之说。本书则据实说明“经综合考察发现，经部各类出力较多的是以下学者：纪昀——易类；程晋芳——书类；任大椿——三礼类……”，以事实证明“经部属之戴东原”的说法不合实际。至于“天文算法类各篇提要皆出震之手笔”的说法，虽出自天文数学领域权威学者的著作，又为当代许多学者所引用，但并无确凿根据。

经本书作者查证，四库全书馆设有专门的天文算法纂修官三人，即钦天监中官正郭长发、钦天监灵台郎陈际新、算学录倪远梅，加之协勘《总目》官李潢，他们“才是天文算法类提要的主要起草者”。事实上本书作者也查证清楚：“永乐大典本《数学九章》便出自陈际新之手。”这就使“天文算法类各篇提要皆出震之手笔”的说法，亦难以成立。还有流传甚广的“史部属之邵晋涵”，“史学诸书多由先生订其略，其提要亦多出自先生之手”，然而，这种说法同样不符合史实，经查，邵晋涵所撰提要稿，多收录于其《南江书录》之中，本书将该书收录的邵氏所撰提要稿，与《总目》中之史部类提要，逐一对照。原来邵晋涵撰写的史部提要，主要限于《史记》、《汉书》等正史，而史部其他书籍之提要并非都出自邵晋涵之手。全书类似以上的观点和结论还有许多，恕难一一列举。值得重视的是，由于这些观点和结论，多以丰富的事实材料为依据，无可辩驳，均堪称定论。可想而知，这些突破创新之论，对四库学特别是对《总目》编纂的研究，必将产生深远的作用和影响。

关于学术争鸣与学术批评

人所共知，中外学术史的发展证明，学术事业的发展需要不断除旧布新，又是在不同学派、不同观念的相互争鸣诘难中前进的。因此，在学术研究中应提倡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开诚布公，开展正常健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不应你好我好，或相互阿谀，或模棱两可，那将不利于学术事业的发展，不利于学术著作质量的提高。同时，也应允许学者有自己的表述特点和学术风格。就此而论，本书作者作为一位尚未及不惑之年的青年才俊，他在学术研究和自己的著作中，锐意进取，坦陈己见，犹如初生之犊，虎虎有生气。书中对于一些先哲和时贤的不同观点，甚或论断失误之处，常常指名道姓，据理相争，或予补正，或予发展，或予批评，甚或措辞尖锐不留情面。这在我看来，也是本书作者的难能可贵之处，应予鼓励。这里，不妨举清代乾嘉考据学大师钱大昕对学术批评的事

例为证。钱大昕在学术研究中从不盲从附和，凡是他认为是对的，不管是什么人，都据实订正，直陈其失。如对汉学祖师郑康成，还有清代前辈学者顾炎武、朱彝尊、胡渭、阎若璩等，他都十分尊重，然而对这些人在学术上的错谬之处，则予据理驳正。为此，其同辈友人王鸣盛写信规劝其不要冒犯前哲，而大昕则复书说：“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况且“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去其一非，成其百是”，“且其言而诚误耶，吾虽不言，后必有言之者，虽欲掩之，恶得而掩之！所虑者，古人本不误，而吾从而误驳之，此则无损于古人，而适以成吾之妄”^①。钱氏的这些言论，反映了他的学术批评出发于“学问乃千秋事”，对学术事业的负责态度，确乃真知灼见。我想，对本书作者在书中对前哲时贤的争鸣与批评，也能作如是观。当然，也还需指出，学术研究发展的历程表明，后来者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进的。因此，后来者对前人相关成果的评价与概述，应尽可能全面、客观和准确，要心平气和，力戒片面和偏颇。

顺便还想提及的是，本书在《余论》中，论述了“四库馆派与乾嘉考据学”，其中对于乾嘉考据学在派别划分方面，提出了与目前学界所持的“吴、皖两派说”、“吴、皖、扬三派说”、“惠、戴、钱三派说”均不尽相同的观点，“试图对乾嘉考据学派提出二分说，即民间学派与皇家学派（也称四库馆派）。民间学派主要指在四库馆之前的考据学派，代表人物有惠栋、戴震、钱大昕等人。皇家学派得到清高宗支持，其代表性人物为纪昀、陆锡熊等人”，并认为“两派在治学理念、治学方法上均有较大分歧”。这确是一种很新鲜的学术见解，四库馆被人称为“汉学大本营”，研究四库馆与乾嘉考据学的关系，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但将乾嘉考据学分四库馆派与民间学派，这在作者对一系列相关问题，尚未能作充分论证的情况下，目前尚难令人理解与苟同，因为这涉及许多复杂

^① 钱大昕：《答王西庄书》，《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九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03～604页。

的问题，很难断然结论，我感到此种看法尚须认真斟酌和深入探索。

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学无止境，治学无尽。对于朝军来说，已取得令人欣喜的成就，值得祝贺。但他在学术征程上，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很远，尚须坚毅跋涉，顽强攀登，直到高点。对此，过来人寄厚望矣！

2005年3月13日 凌晨

写于北京书香斋

自序

四库开馆，拉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既辉煌又沉重的一幕。四库馆臣，皆为一时之选，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他们形成了一大学派。他们中的佼佼者，又成为后人景仰不已的一代宗师。乾嘉诸老，虽然与我们相隔整整两个世纪，但他们留给我们的的是极为宝贵的精神遗产。他们造就了文化长城——《四库全书》，同时，留下了《四库全书总目》这一座巍巍丰碑。一代知识精英，会聚四库馆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吞吐万家，评鹭古今，草创之，讨论之，润色之。十年冷板凳，磨就一利剑。他们用心血和汗水浇铸出一部跨越时空的皇皇巨著，留下了一把打开学术宝库的金钥匙。多少后来者利用它步入神圣的学术殿堂。然而，这把金钥匙是如何打造出来的？是纪昀一人所为吗？是清高宗一人所定吗？现在，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诸色人等在《总目》编纂过程中的贡献作出评价，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以翁方纲还之翁方纲，以戴震还之戴震，以纪昀还之纪昀，以陆锡熊还之陆锡熊，以于敏中还之于敏中，以清高宗还之清高宗。只有如此，才能谈得上客观公正。

本书的写作，从选题、资料的搜集到某些具体观点的形成，得

到了许多专家的指导与帮助。犹记2000年秋天，笔者向戴逸先生汇报博士论文《〈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的写作情况，戴逸先生特地询问了《总目》编纂中的一些问题。当时我想，戴先生站在总揽全局的高度，拈出这一问题，意义肯定非同寻常。因此在博士论文中增补了《〈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略》这一章。尽管搜集了一些材料，但还远远不够。进入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之后，我很快将报告题目由原来的《中国古籍辨伪学研究》改为《〈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并得到章培恒先生、吴金华先生的认可。如果没有三位先生的启发与支持，本书可能难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问世。

进行这一专题研究，采用了业师曹之先生传授的“竭泽而渔”的方法，即研究任何一个问题，首先要把材料网罗无遗，多多益善，然后各个击破，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探究。这一方法看似笨拙，但卓见成效。遵照师教，我首先编制了一份四库馆臣的著作目录，然后踏上征程，按图索骥，在上海、北京、南京、武汉等地的各大图书馆查阅馆臣文集。一页又一页，一册又一册，一函又一函，透过泛黄的故纸，企图寻觅二百年前四库馆臣留下的点点滴滴的雪泥鸿爪。令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的馆臣没有留下蛛丝马迹，成为名副其实的“沉默的大多数”。有时候，我一连好多天都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也曾有过不少苦恼，甚至担心能不能及时完成这一课题。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然而探寻的结果并不都是“凄凄惨惨戚戚”，而是大量的原始材料被淘了出来。伴随着一次次的发现，也就有了一次次的惊喜。

本书将用材料说话，主要使用传统考据学的方式、方法，不厌其烦地向大家展示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对于《总目》编纂研究也许是有用的。同时，我们也会透过材料，发现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难题，并试图在学理上有所提升，有所突破。

近年来，笔者从事四库学研究，得到了学术界前辈时贤的大力扶持和热情鼓励。除在本书后记中所提到的各位先生之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总编辑王俊义教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宋月华编审，北京大学文献学研究中心安平秋教授、杨忠教授、曹亦冰教授，日本金泽大学李庆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傅杰教授，山东大